

媒介与权势

谁掌管美国

(下卷)



[美]戴维·哈伯斯塔姆 著 尹向泽等 译

THE POWERS THAT BE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POWERS
THAT BE

媒介与权势

谁掌管美国

(下卷)



[美]戴维·哈伯斯塔姆 著 尹向泽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与权势 / [美] 哈伯斯塔姆著, 尹向泽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8

ISBN 7-80173-272-3

I. 媒… II. ①哈…②尹… III. ①新闻工作—概况—美国②政治—影响—新闻工作—研究—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9740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6-0444 号

THE POWERS THAT BE by David Halberstam
Copyright © 1975, 1976, 1979, 2000 by David Halbersta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媒介与权势: 谁掌管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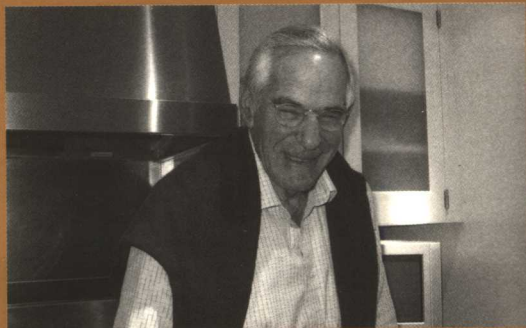
作 者 [美] 戴维·哈伯斯塔姆
译 者 尹向泽 胡燕平 王友贵 沙铭瑶 刘 翔 曹德俊
责任编辑 吴昌荣 李 璞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九章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60 印张
字 数 90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272-3/K·074
定 价 68.00 元 (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E-mail: icpc@95777.sina.net
邮编: 100013
传真: 84257656

哈伯斯塔姆以浩瀚的历史资料为背景,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 20 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果,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 50 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 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预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经济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背后,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界,而政府和新闻界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舍,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总发行人:王庆
总策划人:陈大利



作者简介

戴维·哈伯斯塔姆 (David Halberstam)

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他 20 世纪 50 年代曾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常年在国外工作。1963 年因由西贡发回的新闻报道而荣膺当年的普利策奖，从此声名鹊起。1965 年后，他连续推出《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The Unfinished Oayssey of Robert Kennedy)、《胡志明——北越的领袖》(North Vietnamese Leader Ho Chi Minh)。1972 年他又写出了《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对肯尼迪总统就职后的政治时代作了非常出色的描述。如今戴维·哈伯斯塔姆已成为最受美国人尊敬的记者之一。

立品图书

立品图书

选题提供：许知远

责任编辑：吴昌荣 李 璞

特约编辑：王鸣迪

装帧设计：海云书装

销售热线：010-64462080

读者信箱：tobebook@sina.com

<http://www.tobebooks.com>

目录 contents

1 前言

第一部

- 001 当代广播之父：比尔·佩利 / 3
- 002 新闻人兼传教士：亨利·卢斯 / 31
- 003 钱德勒王朝 / 87
- 004 最杰出的评论员：埃德·默罗 / 121
- 005 从丈人到女婿：《华盛顿邮报》 / 162

第二部

- 006 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 / 217
- 007 摄影机时代：CBS / 244
- 008 钱德勒王朝的兴替 / 282
- 009 报起报落十年间 / 331
- 010 肯尼迪 - 电视 - 尼克松 / 352
- 011 加州州长落选人 / 383
- 012 《时代》的时代 / 396
- 013 菲尔·格雷厄姆之死 / 413
- 014 第一位电视总统 / 438
- 015 改革的代价：《洛杉矶时报》 / 447

第三部

- 016 飘摇的电视新闻：CBS / 467
- 017 时代公司打越战 / 513

- 018 CBS的越战报道 / 568
019 《华盛顿邮报》除旧布新 / 608
020 记者挂帅:《时代周刊》 / 649
021 总编辑风波:《洛杉矶时报》 / 654
022 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 / 667

第四部

- 023 尼克松大败新闻界 / 697
024 水门乍开:《华盛顿邮报》 / 715
025 水门案追击战:《洛杉矶时报》 / 755
026 骑虎难下的《华盛顿邮报》 / 769
027 水门事件与CBS / 783
028 徘徊水门前:《时代周刊》 / 799
029 三名记者的竞赛 / 812
030 水门事件外一章:《洛杉矶时报》 / 826
031 《时代周刊》的最佳消息来源 / 832
032 尼克松卷铺盖 / 842

尾 声

- 033 世代交替:《华盛顿邮报》 / 859
034 购并再购并:《洛杉矶时报》 / 871
035 传播帝国多角化:《时代周刊》 / 878
036 老板不死: CBS / 886

美国政权的形成: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译者后记) / 897

016

飘摇的电视新闻： CBS

一切事物都因电视而加快了步伐。电视简单，也简化着一切。它非常戏剧化，触及了全国大批新观众。像《时代》和《每周新闻》这类杂志因为拥有二三百萬美国读者，一度被视为全国性大刊物，而现在的新闻，每晚在同一时间、同一节目中就能传及六百万人之众（用丹尼尔·肖尔^[1]的话来说是“全国性晚间集会”）。电视能够有力、有效、有情地报道某类事件，并且真实无误。它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歪曲真相，无视公共政策中难以处理的灰色部分。它可以表现某些非道德的行为（如南方合法的种族隔离），因为这类东西显而易见，简单明了。但是，要它应付远为复杂的北方种族问题就困难多了。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既难以戏剧化，也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电视很快对这类问题失去了兴趣。

电视新闻的“制片主义”

在文化节拍加速之中，所有的事物、人物，都来去匆匆。电视使各种事物迅速膨胀起来，也让他们同样迅速地消失下去。根子不牢，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都生活在电子沙漠之上，而不是植根在真实的土壤之中。饱和点与

厌烦临界点都提前了，在争论和问题尚未解决、完成和决定之前，人们对问题本身已经厌倦了。电视增强了人们对越战的兴趣，第一次煽起了对战争的热情，可能因此在战争远未结束之前电视也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进程，将人们置于腻烦状态；当战场上仍然硝烟弥漫之时，战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结束了。电视无记忆可言，它对过去没有兴趣，它抹去过去的历史，没有时间播放过去事件的剪辑，所以它势必加快未来的到来。最重要的是速度和活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次，报道安息日的制片人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玛耶·麦克劳克林（Marya McLaughlin）：“今天你在做什么？”“正在决定是否报道一次示威。如果不报道，这次示威就不会举行。”她回答道。

对于专业人员，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电视是一种背叛。仅仅一部打字机和一名记者，一名记者和一个麦克风再加纽约的一名技师已经不够了，还必须要有影片、音响和若干的技工，最重要的是要有制片人。一些不必经过训练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可能明白，但也可能不明白某个新闻事件的真正意义。制片人是一种新的品类，被培养去发掘和寻找片子中的戏剧性。60年代权力逐渐从记者手里转移到制片人手中，60年代末，记者苦涩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制片人主义”，在这个体系中，新闻制片人控制着新闻，政府或某议员的办公室可以不给记者打电话，直接向制片人概略地勾画出某个新闻事件，解释某部片子的可行性，报道的任务分派单由制片人签名，上面还常常加有这样的标记：“有接受任务的资格和才能”。接受任务的资格和才能，这完全颠倒了传统的新闻程序。传统的程序是记者赶赴采访现场，用眼、用耳发现重要的东西，发现值得报道的东西，然后告诉本部。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平衡。记者最多只对事件本身做出反应，而制片人则对各种远为复杂的刺激因素——影片、管理、对节目的要求、收视率做出反应。制片人，就连最好的、最正直的制片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经营部门，较之记者，他们对新闻节目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承受的压力感觉更加敏锐。制片人懂得收视率对以群众为基础的新闻节目的重要性，收视率考虑戏剧化，考虑视觉效果，考虑观众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可以吸收国际或者复杂的新闻报道的程度，以及其他广播公司以影片形式加以利用的可能性影片。影片是最重要的。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对新闻的不同的判断标准：戏剧化

的东西，中看的東西，人們願意看的東西，以及人們可以接受的令人不快的壞消息的程度。供二千萬人看的視覺新聞的組成原則與支配編輯供一百萬左右上流讀者看的（如《紐約時報》等上流報紙）的原則完全不同。

權力和可行性的變化始於1962年出現的半小時新聞節目。1960年政治家對電視的看法與1964年的看法有著天壤之別。1960年，電視深刻地影響了競選和亮相的方式；到了1964年，電視已成了競選本身，過去十五分鐘的節目多少只能算無線電廣播的衍生物，陣勢小，還缺乏力量。可能實際只有十一二分鐘的廣播時間。技術知識、技術手段和膠片都比較原始，不少畫面只是說話的人頭。隨後突然間起了變化：二十二分鐘的時間，轉速越來越快的新型膠片、小型攝像機。不久又出現了衛星轉播站。突然間，新聞節目開始需要大量的採訪人員，需要建立新的辦事處，播放時間需要內容，影片需要拍攝。20世紀60年代初，在廣播公司行政人員決定是否採用半小時新聞節目的關鍵性會議上，嚴重的問題是能否有足夠的影片和新聞。須臾之間，採訪記者變得重要起來。代替四十五秒鐘的可能是兩分鐘。一夜之間，記者獲得了這個國家的最強大的政治讲坛。政治家總是到人們集聚的地方去，而1963年人們每晚都聚集在自己的娛樂室內。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變化不論對政治家還是對公眾都不起眼，因為1964年的大選掩蓋了變化。那是一場力量懸殊、局面明朗的選舉。很明顯，約翰遜將生吞戈德華特。然而，對1964年進行採訪的報刊記者來說，整個安排的變化是非常清楚的，現在的競選已非昔日的競選，再也不是爭着占有東海岸大報的主要版面，而是爭搶晚間的新聞節目，最重要的是攝片。必須適應電視鏡頭。1960年最有技巧的競選人新聞助理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得到詹姆斯·賴斯頓的正面評論專稿，以及《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的頭版報道；而現在，電視是第一位的，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有好片子在晚間新聞播放。西奧多·懷特是一位懷着特殊興趣觀察這個過程的人，用他的話來說，這個變化就像從手工操作的單頁印刷機進入了滾筒印刷機一樣。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葉，西格·米克爾森和其他一些新聞行政人員就希望有人替換道格·愛德華茲^[2]充任晚間新聞的節目主持人。愛德華茲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第一位節目主持人，他在電視初創時期得到這個職位。他很漂亮地抵擋住了全國廣播公司約翰·卡梅倫·斯韋茲（John Cameron

Swayze) 的“骆驼新闻大篷车”(Camel News Caravan) 节目, 但是亨特利-布林克利的崛起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爱德华兹没能播出米克尔森和其他人所希望的有分量的东西。他的个性不是那样踏实有力, 不足以稳定一个新的现代新闻节目。道格拉斯·爱德华兹结束晚间新闻时常说, 情况就是如此。但是人们并不一定就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开始米克尔森试图用查尔斯·科林伍德换下爱德华兹其原因有二, 一是科林伍德是默罗小组的成员, 他十分灵活巧妙地将收音机过渡到了电视, 他有才华、有魅力, 是文采优美的作家, 看来他是默罗的传人, 也是默罗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二是行政人员对他的看法甚好, 再说, 他还是佩利的私人朋友, 战时, 他和主席一起待在伦敦。但是, 当时赞助人很有力量: 一个赞助人就能掌握整个节目, 帕尔·玛尔的人对撤换道格拉斯·爱德华兹以任用查尔斯·科林伍德完全不感兴趣。帕尔·玛尔喜欢道格拉斯·爱德华兹。

电视新闻的“阿富汗原则”

随着新闻节目重要性的增加和全国广播公司收视率的上升, 要求新的节目主持人的压力增大了。人选对国际国内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要播放的新闻节目的类型。在播音行业的雄心勃勃、形象高大的明星群中, 为争夺这个职位展开了很激烈的竞争; 重要播音员从未受过缺乏自我的指责, 他们想成为具有决定权的人的愿望十分强烈。在潜在的新的主持人中, 霍华德·史密斯和埃里克·塞瓦赖德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都遇上了如何表现自己才华和风格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是超级明星, 他们不仅是记者, 还是评论家,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评论很精彩, 尤其当评论来自国外时更是如此, 但是, 他们回国之后, 负压力增大了。塞瓦赖德对杜勒斯经常性的批评激怒了高级官员, 不过, 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国外, 不存在大的麻烦。但是史密斯却一直处在麻烦之中, 回到华盛顿后, 他的稿件上出现了很多的删改, 麻烦比塞瓦赖德大得多。朋友们认为, 部分原因是风格的不同。塞瓦赖德是个更为细腻的作者, 更富于技巧, 他学会了在表达激烈的观点时不显出激烈的痕迹, 而史密斯则是一个强硬的作者, 他运用尖锐、直率、肯定的句子, 非常直截了当, 人们从来不会误会他说的话和说话

的方式。

塞瓦赖德和史密斯都越来越受挫于对他们增加的压力，而希望见到佩利，而佩利却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日益紧缩的控制就意味着承认了控制的存在。讨论今天和昨天的不同也就承认了确有不同之处。塞瓦赖德因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增长的好战精神和对亚洲缺乏精细的辨别力而不安，对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这样强大的组织没有能力指出这一特征，没有能力展示真正的外交政策辩论的可能性，他感到忧虑。最后总算安排了塞瓦赖德和佩利之间的会面，但是会面不成功。佩利（现在他的朋友在白宫，他以政治上、社会上的密友为转移，将火力对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每一点冒险的新闻思想）把距离拉得很开。塞瓦赖德提出了问题，谈到现在的报道和任何评论都困难重重，大量的编辑和删改，佩利对此置若罔闻：这是公正法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必须公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能超越队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能享有保持观点的奢侈。塞瓦赖德争辩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从来就是第一流的，战争期间它显示出了领导的英姿，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必须显示出领导的身份，必须帮助廓清一次急需的公开辩论。抹杀公众关注的重要焦点的情况太多了。如果说新闻人员有专门的知识——这一点在公司内部意见也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将知识传递给听众，这些东西比政府目前讲的要多得多。但是，佩利寸步不让。他对领导地位不感兴趣，尤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可能对商业广告的领导地位感兴趣）。一无所获，他带回来的是现成的回答，什么公正啦，信任啦，还有政府的批准等等。关于职业性和情报的限制，以及记者是否应该根据其他人对客观性的定义，表现出比他本人更无知的样子等，已是年代久远的争论了。西格·米克尔森会见时在座，他感觉到佩利决意不理睬塞瓦赖德所说的任何一个字，所有的决定早就做出了。

霍华德·史密斯是同一问题的牺牲品。他在国外待了二十多年，于50年代末回国，报道美国事务。他是一位有才智又深沉的记者，一个很复杂的人，即便在冷战最盛的时期，他也没有同意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相反，他看到了东欧民族主义的渐变，这不是流行的观点。因此，他常常受到攻击，攻击他过于“左”倾。在伦敦时他就习惯了对他每周新闻评论程度不等的编辑和删改。现在，回到美国，他发现情况更是不同。每当他惹恼了某个重要

政治家，这位人物就会给他上司打电话。他发现了新闻界的一个症结，《纽约时报》一位著名记者托妮·卢卡斯（Tony Lukas）将此称作“阿富汗原则”（Afghanistan Principle）。卢卡斯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不发达地区待了六年之久，他很快明白作为一名《纽约时报》驻国外记者，你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直率、尖刻、敏感地对待当地政府，来自本部的影响惊人的少。你越靠近华盛顿或纽约的权力中心，你能够说的东西就越少。如果你用叙述印度总理的那份自由来描述纽约的供水监督，那你的评论说不定就不能付印。显而易见，阿富汗原则的基础是：真相在远方才能舒适地存在。

从欧洲回来后，霍华德·史密斯发现自己处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使他的评论变得越来越温和，高级行政人员阶层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愤懑：他似乎是最得罪政府、得罪佩利的保守派朋友的人。1961年初，默罗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肯尼迪工作时，他正在准备一部有关伯明翰（Birmingham）种族政策的“CBS报道”（CBS Reports）的新闻片。史密斯被派去接替这项工作。片子有一段演的是，在暴徒殴打支持公民权的工人时，伯明翰的警察袖手旁观的情景。史密斯本人是南方人，看到这里，他也震惊了。他曾目睹纳粹和法西斯的兴起，现在，他回到美国，看到了同样的征兆。在解说中他引用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手段就是使好人无法有所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级官员已经敏感到南方机构的怨恨情绪，他们想把此话去掉。（在和史密斯的争论中，弗兰德利说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对于电视片来说，用不着如此暴露性的评论，影片本身就有很强的破坏性，它本身就说出了一切。）史密斯寸步不让，坚持保留此话。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布莱尔·克拉克恳请史密斯不要引起冲突，告诫他佩利希望的是一个整体。克拉克每周和佩利见一次面，十分清楚在佩利心目中名声最坏的是霍华德·史密斯，主席积累了大量不利于史密斯的抱怨，眼下认为他是一个负担。克拉克请求史密斯不要强行推出这个问题。但是，史密斯仍然这样做了，不久他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了美国广播公司。

谁将成为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呢？是塞瓦赖德、科林伍德还是外来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1961年结束时，越来越清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要延长到半个钟头，于是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成为广播公司最有声望的职位了，但是，这个职位不是一位评论员的职

位。电视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它不适合评论和评论员的个人自由。晚上定时露面的记者是一种有趣的结合体，它的一半是通讯记者（在个人的表达和简洁报道的狭隘意义上），一半是超级明星。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在总统竞选中，人们可以认出他们，公众和不少竞选人将他们引以为友。但是，尽管记者的权力如此之大，上镜头的时间却十分有限，以至于他们常常显得只是部分就业。他们常常认真严肃，富于才智，谙于世道，他们拥有的知识超过了他们的晚间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负责短暂的新闻节目的报道队伍的洞察力与他们在全国代表大会或水门事件时的作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半小时的新闻节目仅仅像一张浓缩着《纽约时报》的邮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流传着一位标准内幕人物的笑话，如果摩西下了山，头条晚间新闻就会是：“今天摩西带着十大戒律下山了，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主播之路

塞瓦赖德和科林伍德可能算是默罗的信徒，而克朗凯特则是一位外人，他从未撞进过内幕集团，但是，他的风格和现在节目的需要相吻合。他的根植于无线电通讯业务中，是一位突然出现在生活中的通讯记者，他速度快，简洁，抢先发表新闻，抓紧发报时间；他正跃跃欲试。无论对朋友还是听众他讲话都一样直截了当，简单清楚，他对新闻事实的兴趣大于对新闻的分析。观众容易勾画出沃尔特·克朗凯特跳进汽车、奔赴火灾报道现场的情景，却很难设想出他写一篇关于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有思想的评论的模样。他在刚操此业之始，就是四周的一个贪婪的记者，具有狂热的竞争精神，没人能在某一新闻事件上击败沃尔特·克朗凯特。随着年岁的增长，成功的增大，他却丝毫没有变化，胸中仍然燃烧着烈火，真是令人惊叹。1952年他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治节目主持人，在采访全国大会的记者中，没有人比他准备得更充分，更精通业务，具有更好的背景；如果去报道空间发射，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经历那么多的不眠之夜，预先掌握空间知识和航天历史，并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当他利用助手核实事实时，只有在助手能够证实最苛刻的问题，并使他能够为事实担保之时，助手提供的事实和准备的材料才能记入沃尔特的本子（这意味着上电视）。

然而，绝妙的是，他看上去并没有竞争的模样；他看上去闲暇而稳重，不慌不忙，十分克制。这是令人羡慕而又十分幸运的各种品质的结合。他的职业作风使他易于共事；他表里如一，他喜欢，甚至热爱成为沃尔特·克朗凯特自身，他对生活，对工作有一种热情，这种热情仍然带有刚进入大城市的天真的农村孩子的味道，一种惊奇感和热情。在这个行业中充满着自我，十分平常，甚至连根基也不稳的人，常常一夜之间就能蹿红，成为超级明星，这确实是令人眩晕的酒精。克朗凯特极大地控制了自己强烈的自我，不像他的同事，极少公开显露出来。他善于表演业务，丰富的嗓音恰到好处，能引起听众的兴趣和信任，应该这样，他明白只能到此为止。他是有年头的通讯记者了，他对新的成功和名声感到不安，起码表现出不安的模样，这确实不错，可以保持某种平衡。他的世故恰好使他显不出世故。他身上有着“难道这就是事实吗？”的味道，这确实是一种绝妙的保护手段，意味着另一个人不停地说，不停地解释，而他，克朗凯特则从不担负义务和责任。

再说，他的身体也十分强壮，有很强的耐力。在那个行业里，人们称之为气壮。他可以在高度集中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整夜工作，既不间断，也无倦意。看上去他毫无厌倦之情，即使面对令人厌倦的事情也同样如此。当布莱尔·克拉克和西格·米克尔森推荐他担任此职时，这种纯粹的耐受力，这种被视为农民的东西，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是强劳力。反正，节目主持人不一定非要具有智者能人的品质不可，他必须做的只是对其他人的综合。有人认为塞瓦赖德仅仅是因为他的才智标出了自己的价码而与众不同，埃里克对分析和观点的兴趣过大，因此，他不是一个人令人放心的直输信息的传送带。他是知识分子，在严肃的杂志上撰写严肃的文章，不过，他也同样想当节目主持人，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矛盾。当发现克朗凯特将得到这个职位时，他勃然大怒。“不管怎样，我为公司做出过贡献。”他向布莱尔·克拉克抗议道。

克朗凯特的形象妙极了。他看上去像美国中部人，模样没有一点刁滑之感〔他是密苏里州圣乔（St. Joe）的一位牙科医生的儿子〕，他来自内地，人们认为来自中西部的人可靠，他们是土地的儿子，而不是人行道上的游客，在美国神话中，土地教人真正的价值，人行道则教人专寻捷径。他虽然曾是一名驻外记者，非常优秀的记者，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斗

争不激烈、分野不明显的日子里，他的电视形象则是地道的美国人形象，一个优秀的美国人形象。他曾报道过全国代表大会，典型的美国大会，报道过空间发射。报道这些大型事件且不引起人们的怒气。当有艾森豪威尔的特约采访时，则由沃尔特进行报道。人们看到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感到放心。艾克和沃尔特配合很好，两个讲得都不错，分享着其中的价值。（感到不快的人当中有约翰·F·肯尼迪，1960年，他当选总统后不久，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唐·休伊特拉到一边。“沃尔特·克朗凯特是共和党人，是不是？”肯尼迪问。不是，休伊特说，他认为沃尔特不是。“他是共和党，他是共和党。”肯尼迪说，“我知道他是一名共和党。”休伊特再一次说沃尔特不是。休伊特的确怀疑克朗凯特投了艾森豪威尔的票，没投史蒂文森的，同样他也怀疑克朗凯特投了肯尼迪的票，没投尼克松的。“他老是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肯尼迪坚持说，“总是和艾森豪威尔一起拍照，和他同行。”）

克朗凯特小心翼翼不让自己与人为敌，他严格把关，不显露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偏见，这是哥伦比亚公司今后十年的一笔财富。克朗凯特在真实的意义上代表了美国的中心，每当他与中心产生抵触之时，自己都能敏感地意识到。对他来说，进行编辑就是与政府做对。他很少具有，他的雇主也不希望他具有编辑意识，他进行的编辑都下意识地、自动地和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他从不鲁莽行事。他的通讯记者的背景在他身上深深植下了对记者活动界限的强烈意识，这种意识和管理部门认为的节目主持人的角色、新闻的作用融为一体。克朗凯特代表了一种新的品类，而他又在这新的品类中遥遥领先。他有足够的聪明和风雅使他对自我的权力感到不安；而这个职位所需要的限制也融于他的身体之中。所以他被选中安排半小时的新闻节目——他持有温和态度，是为广大群众而出现的群众性人物。

他成了一种格局。和总统影响相媲美的不是他的权力，而是他的影响。1976年，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他和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谈到爱德华不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时，他说道，如果肯尼迪不竞选总统的话，他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你不需要靠当总统来增加你在国家中的影响。连当一名议员也不需要。”肯尼迪回答道。随后，他紧紧盯着克朗凯特。“克朗凯特先生，你很重要。”沃尔特·克朗凯特确立了电视中其他人借以做出判断的标准。他在第一次上电视前就成熟了，到20世纪60年代末，



1970年，美国国民警卫队向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开枪，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